

民生，均遭損害。諸書多

格，而王澐則據

卷百八與遊二篇

（順治十八年），子從蔡

遷而書蘇納海等分詣江浙

曰：此北平人方是煥所獻

三學集

來新夏



齊東野語

PDG

來新夏著

三學集

中華書局

新學
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学集/来新夏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南开史学家论丛. 来新夏卷)

ISBN 7-101-03300-8

I. 三… II. 来… III. ①中国-近代史-文集
②方志学-文集③目录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254 号

责任编辑:柴剑虹

南开史学家论丛

三 学 集

来新夏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河北廊坊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8¹/₄ 印张·43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32.00 元

ISBN 7-101-03300-8/K·1424



缘 起

张国刚

壬午仲秋,“南开史学家论丛”将付梓,兹赘片言,以明缘起。

先是,己卯春,魏宏运先生、刘泽华先生偕余应约赴北京范曾先生寓所,商谈成立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之事,时范公友人企业家白君、许君亦在座。是年秋,南开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举行范曾书画展,一时士林耸动,学界泰斗季羨林、数学大师陈省身且亲临剪彩焉。翌年三月,东方文化研究院获批准建立。当是时,范公及白、许二君慷慨捐赠,资助研究院之历史学图书出版,并冠其名曰“范伯子史学基金”。伯子者,范曾先生之曾祖父,清季同、光诗坛领袖范当世先生也。于是,遂有刊印“南开史学家论丛”之议。推泽华先生为主编,余为襄理庶务。第一辑八书,曰《及时学人谈丛》、曰《伯伦史学集》、曰《陋室文存》、曰《古史集林》、曰《探径集》、曰《学忍堂文集》、曰《三学集》、曰《楔斋文录》。其作者或已归道山,或年届耄耋,并为史界巨子,南开名师。编委会同仁皆深荷其教泽,仰止之思,惓惓不已。八书问世,既为吾师庆,亦为学术庆,且喜将有以鸿文传教后昆也!

中华书局及各界友人鼎助论丛出版,谨申感激之忱!

壬午八月初十五日谨记于南开园

南开史学家论丛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力序)

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

范 曾 李治安 陈振江 张国刚

主 编 刘泽华

副主编 张国刚 李治安



总序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自开设科系至于拓为学院，前后垂八十年矣。肇始之季，史界翹楚，皆欣任教席，其最著者为梁启超、蒋廷黻、蔡维藩、刘崇鋮、范文澜诸公，此数人皆根于博识而详于考实者，于近世皆以典著精审为世所共识。南开史学之博约宏贍，可谓其来有自。解放后院系调整，北大与清华两府史魁郑天挺、雷海宗于南开树帜，一时卓越史家吴廷璆、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黎国彬、来新夏、辜燮高、魏宏运云集而景从，自此以降，半世纪来蔚为国中史学营垒，气象葳蕤。后继者潜修锐进、不坠薪传，欣睹其旺，南开史学院誉薄海瀕，岂徒然哉。

史之为学，司马迁概之曰“述往事思来者”六字。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乃研究史学之大旨。其博学之，谓勿以疏漏也；审问之，谓整纷别蠹也；慎思之，谓祛惑释疑也；明辨之，谓去伪存真也；笃行之，谓济世匡时也，此数事于南开史学名师之文中有之矣。

即以郑天挺先生《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为例，经先生钩稽玄微，清代统治者，实为汉满蒙古之混合血统，此论既出，则清室“以龙兴东土、朱果发祥之贵胄自炫”之说即告溃萎。先生又详证满洲实为部落之名称，“与国无涉”。而侵略者骄横，欲以清之末世溥仪而立满洲国，于史无据，可称谬妄极矣。读毕真似闻老吏断狱、要言不烦，不禁击节喟叹。又以王玉哲先生《周初三监及其地望问题》一文为例，先生揆诸当时情势，证以史籍、考古，以为周初实力所统辖者有限，“武王所置三监之邶和鄘绝对不可能远到河北北部和山

东中部”。予王国维凭诗人之想像以为“邶即燕、鄘即奄”之说以不复容辩之否决。它如清姚鼐、近人顾颉刚有关三监之说，亦一一驳析，至此三监历史之悬案冰解壤分，豁然大朗。王玉哲先生固温良恭谦让之君子，而于学术诤诤然如此，亦自感责任綦切，不为先贤讳也。

六十余年前杨志玖先生以英发少年，于浩繁之《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确来中国之铁证，凿凿之说，与西人伯希和并肩，为硕学汤用彤、向达先生所激赏，遂为史界定论。亦有立异眩世者东来讨问，见先生蔼然长者，抱“以文会友”之雅怀，不禁肃然起敬，遂偃旗息鼓西归。要之史学家必有“坚不可摧的证据”（王玉哲先生语）然后立有益当代，泽被后世之言说，前辈懿范，岂可轻忘。

史家之道德，亦有大谬不然者，或如鲁迅先生所讽，为历史“涂抹些自欺欺人的脂粉”；或如刘歆篡改史乘，以为王莽立言。此类史蠹，不绝如缕，为史家立障，难辞其咎。清乾嘉以来，吴、皖学派，考据鼎盛，功不可没。南开史家以勘讎考据、细绎群书之学视为立论之基石，而不以先验之立论而检索史实为能事，后者直为治史之大瘤。知行合一，固为至论，而一切真知，皆来自治史之实践，必以历史之真面为终极追逐。郑天挺先生所言“真理标准决定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历史科学是从争鸣中发展起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之出为1961年，可谓言简意赅，深挹肯綮。

乙未之夏我以十七岁考取南开大学历史系，至今四十六年矣，彼时以能亲聆史学大师警咳为最大荣幸。其时诸师亦皆壮年，滔滔雄词如坐春风，雷海宗先生开世界上古史，其博学强记、考索史实，略无半句废言。至历史紧要处如西罗马帝国之覆亡，则谈兵说剑、飙风扇发，泉飞藻思若此，恐同代诸公，难有望肩者。又如谢国桢先生授南明史略，则对半壁破碎河山中金陵福王、福建唐王、广西桂王

之消长慢慢道来，其史籍之烂熟于胸次，如数家珍。不期反右中雷海宗先生为康生所深恶，必除之而后快，定为史界极右，今虽彻底平反，而枵触前尘，恻焉涕下，曷胜今昔之叹。

今南开大学史学家论丛出版，刘泽华兄属为序，亦欲述其渊源、敦励风尚，以传于后之来者，使知青嶂之远、白云之深，谨惶恐奉命如上。

范曾 壬午夏於南開



自序

来新夏

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里,父叔常年谋食四方,家中事无巨细都由祖父主持。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从师于俞樾;又是日本弘文书院的留学生。在日本曾任同盟会主办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加盟光复会,在家乡从事新式教育的劝学工作。辛亥以后,他敝屣荣华,依然在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任职。他一生潜研学术,寄情诗词,笔耕不辍。所著有《汉文典》、《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和《易经通论》等多种。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认真,非常严格地对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基础。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七岁那年,我因父亲供职天津即随母北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祖父,以后虽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不时写信来,指导我读书和修改我的习作,直到他高年辞世时为止。

我从小学到大学遇到过不少良师,他们都从各个方面给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前一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之交,我在天津一所中学读书,有一位年轻的国文教师谢国捷,专攻哲学,是史学家谢国桢的六弟。安阳谢氏,家富藏书。谢老师又很慷慨倜傥,师生

间十分契合,因此我得以借读谢氏藏书。谢老师还常和我谈些治学方法和经验,鼓励我写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此文后来在陈垣老师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终于成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40年代初,我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有幸亲受业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和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之门,他们都为我日后走上学术道路耗费心血,特别是他们的谨严缜密、求实求真的学风,成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资质驽钝,虽全力以赴,至今未能达到师辈的标准,而深感有负师教。当时正处于日寇侵华的沦陷区,老师们坚贞自守的爱国情操,更是一种无言的身教。

我大学毕业时,正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人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以为可以报效国家,有所作为。孰知事与愿违,政府的腐败令人大失所望,我无可逃避地像许多人一样走上一条毕业即失业的道路,虽然经过亲友的帮助,曾在一家公司谋得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但为时不久,公司倒闭。又赋闲了一段时间,才经读中学时一位老师的介绍,到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当时,解放战争已临近全面胜利的边缘,天津的解放也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一些革命理论和思想的灌输,热切地期待着新生活的来临。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欣悦。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我积极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不久,经民青驻校领导人的动员,我和另一位同事张公骥兄被保送到华北大学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训。于是,脱去长袍,穿上用紫花(据说是一种植物)煮染过的粗布所缝制的灰制服;抛去优厚的工薪制,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给制。一股堂·吉珂德的革命热情产生着革命的冲动。为了和旧思想、旧习俗……等等旧的一切割断,作个新人,我们又学习那些先行者改名换姓的革命行动,偷偷地商量改名问题。张兄利用名字中骥字的马旁,又想在革命大道上奔腾,所以改名马奔。我则用

名字的最后一字“夏”与“禹”相连而改姓禹，又大胆地以列宁自期，取名一宁，暗含着彼一宁也，我一宁也，将相宁有种乎的傲气。张兄一直沿用马奔这个革命名字，我则幸亏以后又恢复了原姓名，否则文化大革命中这将是一条大罪状——居然敢以列宁自期。政治培训期满后，张兄南下到河南，我则被留在华北大学的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从此我就从古代史方向转到近代史方向，并在范老和荣孟源先生指导下写出第一篇学习新观点的文章——《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作为太平军起义百年的纪念。

当时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入手。这批档案是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过来的藏档，没有做过任何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都有脏污之物，要抖干净就会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土扬尘中过日子，直到下班，不仅外衣一层土，连眼镜片都厚厚地积上灰尘，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想闯过这个尘土飞扬的阶段，工作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的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来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已，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清理麻袋中档案的工作告一段落，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研究室集中十来天让我们读一些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在大学时除了读过一本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外，所知甚少，就乘此阅读了一部分有关著述。下一阶段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将初步整理成捆的档案，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类分开。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

阅读后,在特制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末签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分类归架。因为看得仔细,常常会发现一些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随手札录下来。在休息时和在宿舍里彼此都能毫无保留地交谈心得,既增长学识,也引起追索的兴趣,有时便在第二天去追踪原档,了解具体内容。前后历经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艰苦,但却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科领域,它成为我一生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中心研究课题。

1951年春,范文澜老师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之请,同意我到南开大学任教。从那时至今已整整超过半个世纪。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南开大学。我在南开大学从助教做起,历阶晋升至教授。在新的岗位上,我除了坚持科研工作外,又开始新的教学生活。我到校不久,由于吴先生奉命赴朝慰问,他承担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任务便落在我的肩上,我夜以继日地突击备课,居然在吴先生离校时披挂上阵。未曾想到竟然一举成功,受到学生的欢迎。吴先生凯旋后,看我已能胜任,也就让我教下去。从此,中国近代史就是我教学工作中的主要项目。此外我还教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通史、古典目录学、历史档案学、鸦片战争史专题和北洋军阀史专题等,同时我仍然坚持北洋军阀史方面的研究,继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到南开大学的第二年——1952年,我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虽然还不太成熟,但从此正式进入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程序。不久,我在荣孟源和谢国楨二先生的指派下,受命筹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的编撰工作,搜集了较多的资料,可惜由于人事变迁而中断,虽有微憾,但却意外地接触不少有关北洋军阀的资料,为日后撰写《北洋军阀史略》作了必需的准备。1957年,我在荣孟源先生的推荐下,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力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史的专著——《北

《北洋军阀史略》,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曾译此书,并增加随文插图,易名为《中国の军阀》,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学者案头用书。六七十年代因接受政治审查,研究工作中辍,但我仍然暗暗地搜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直至七十年代末,我的问题才解决。1983年,由于社会稳定,文化需求与日俱增,湖北人民出版社又邀约增订《北洋军阀史略》,我也以能重理旧业,兴奋不已。于是,出其积累,补充史料,增订内容,撰成《北洋军阀史稿》。九十年代前后,有关资料较多出现,于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下,与我的学生们共同编纂了有300余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从而接触了大量资料,开拓了视野,丰富了知识,终于和几位多年合作的学生,在世纪末完成了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我自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已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我也乐观地自信在这一领域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重出同一题材的著述。此外,我还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其他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工作,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后来大部分编入《中国近代史述丛》和《结网录》两本书中。

六十年代前后,编修新方志的创议者梁寒冰先生,多次动员我参与其事,我一则被寒冰先生的盛情所感,再则我的祖父曾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独力修成一部70余万字的《萧山县志稿》,我理应克承祖业,为新编地方志尽一份力。于是在寒冰先生领导下,开始全国修志的筹备工作,并以河北省丰润、霸县等地为试点。正在顺利推进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陡起,我和寒冰先生在不同单位都因发起修志而被扣上“举逸民”的罪状,并从我家中抄走有关修志的文件和资料,作为罪证。但我们的修志志向并未因此而稍减,我还在被批斗之余和被监管的日子里,读了一些方志学的著作。七十年代末,灾难的十年终于过去,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拨乱反正,百业俱兴。我和寒冰先生亦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发动全国性的修志工

作,我承担了初期培训和组织修志队伍的工作。1983年春,在华北、西北、中南、东南四个大区同时举办了四个培训班,讲授修志基本知识,并在讲课的基础上,由我主持编写了第一本修志教材——《方志学概论》。与此同时,我也对方志学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并应邀到一些地方去演讲。1993年夏,我承曾供职过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盛情,出版了《志域探步》,作为我七十岁的纪念。不久,我又应台湾商务印书馆之约,对《志域探步》作了全面增补和修订,撰成《中国地方志》一书,成为我在方志学领域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命运往往在拨弄人,十年动乱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切又归于平静、正常。我也从六十年代以来那种百无是处的境地中解脱出来,问题结论了,政策落实了,我的聪明才智似乎又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价值。八十年代前后,当我临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已在准备退休,而我却方被起用,迎来了一生中唯一的辉煌瞬间。我在一两年内荣获了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等诸多头衔,校墙外面的虚衔也如落英缤纷般地洒落到头上来。但历尽坎坷的我始终保持清醒状态,视这些“荣华”如过眼烟云。一方面兢兢业业做好各项本职工作,以不负委托;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立足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点上。于是,我结合新的事业,又转向于图书文献学领域。在这公务繁忙的十多年过程中,我主持编写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词典》和若干专门性论文,开辟了我学术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领域。

综观自己的大半生,都是在笔耕舌耘的生活度过。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最近从旧报上发现好几篇中学时代写的文章,如《诗经的删诗问题》、《桐城派的义法》、《清末的谴责小说》和《邃谷楼读书笔记》等,还写过一些随笔散文。

这种笔墨生涯一直延续六十年而不辍,撰写了多种学术著作,代表了我致力学术研究的三个方向。历史学方面主要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史述丛》和《结网录》等,方志学方面有《志域探步》、《中国地方志》和《中国地方志综览》等;图书文献学方面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古典目录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古籍整理散论》等。这些著述中有些曾遭遇过不幸的厄运。如我因为要把中国近代史教的有点新意就努力开发新史源。曾集中精力,历时十年,本着专攻一经的精神,读了八百多种近三百年的人物年谱,每读一书,辄写一提要,积稿达五十余万字,又经修改成定稿十册,不幸于“文革”时被抄走,发还时仅余二册,幸初稿尚在,乃于七十年代下放务农之暇,重加整理,再一次写成定稿,题名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都56万字,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十年时间通读一种史料后,终于对近三百年的人物、史事轮廓获得了大体了解,这或许也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在颇为恶劣的氛围中,只有专攻一经才能修复不平的心境,并完整地掌握某一学术领域的基本内容。也许这是我在无奈中摸索到的一条治学门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前一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我渐渐感到我自己的社会职责尚有所亏欠。我虽然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尽了一份力,但那个圈子很狭窄,忽略了更广大的民众对文化的需求。我没有尽到把知识回归民众的责任,于心有愧,于是不顾圈子里朋友们的“不要不务正业”的劝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向民众谈论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同时我也想用另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情之作,给新知旧雨一种求新的感觉。写来写去,积稿日多,在九十年代竟然连续出版了《冷眼热心》、《一苇争流》和《来新夏书话》等七种小集。我的一位早期学生戏称我是“衰年变法”,我亦甘愿受之而不

辞。

我依然在舌耕笔耘的漫长道路上走着,我将以余年完成尚在进行的《清人笔记随录》一书。这是对清人所撰三百余种笔记所写的书录,体例一依《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现已完成草稿,准备再以三五年时间完成定稿,使之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并成为我致力“为人”之学的证明,也为清史研究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还有余力,我将在无怨无悔的恬静心态下,回顾自己的一生,实话实说,写一部自述,以明本志。

这是我简编的自选集,包括我一生致力于学术的三个方面,即: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有友人曾括称为“三学”。我一生治学则持一种“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态度,至老不辍,也可概括为“三学”,所以我将这个自选集命名为《三学集》,祈识者鉴察!

二〇〇二年二月中浣写于南开大学蘧谷



目 录

自序	(1)
----------	-----

(一)

中华文化建设的跨世纪展望	(1)
儒家思想与《史记》	(11)
清代前期的商业、商人与社会风尚	(24)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阶段问题	(67)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90)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19)
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	(152)
试论清光绪末年的广西人民大起义	(167)
论近代军阀的定义	(199)
论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	(213)
王鸣盛学术述评	(229)
林则徐传论	(251)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译本序	(269)

(二)

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	(274)
---------------------	-------